

□刘永加

唐诗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,现存的五万余首唐诗不仅是艺术的宝藏,也是唐朝社会各方面史料的遗存。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,我们不妨到浩瀚的唐诗中去看一看盛唐社会的防火情况与消防意识。

据记载,隋唐五代数百年间发生各种重特大火灾三百多起。正是由于当时火灾频发,作为诗歌文学盛行的时代,唐代的诗人们没有等闲视之,而是拿起手中的笔,记载了一些火灾现象和对火灾的反思,进而反映了当时的消防理念。

唐朝诗人薛逢写有《禁火》一诗,反映了当时的防火状况,其中写道:“日日冒烟尘,忽忽禁火辰”,说明当时人们还是比较重视防火的,往往采取禁火的措施来保障消防安全。

被称为诗圣的大诗人杜甫写过一首《火》诗,其中写道:“青林一灰烬,云气无处所。入夜殊赫然,新秋照牛女。风吹巨焰作,河棹腾烟柱。势俗焚昆仑,光弥焮洲渚。腥至焦长蛇,声吼缠猛虎。神物已高飞,不见石与土”,描写了大火吞噬万物的恐怖场景。

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《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》一诗有云:“摆磨出火以自燔,有声夜中惊莫原。天跳地踔颠乾坤,赫赫上空穿崖垠。截然高周烧四垣,神焦鬼烂无逃门”,记录了一场特大火灾场面,观之骇目惊心,六神无主。

唐朝诗人吴融《赴阙次留献荆南成相公三十韵》一诗,则描述了地方官员组织救火和灾后重建:“卓旗云梦泽,扑火细腰宫。铲土楼台构,连江雉堞笼。似平铺掌上,疑涌出壶中。岂是劳人力,宁因役鬼工。本遗三户在,今匝万家通。”由此可见,唐代诗人关注到了多地、多场次的火灾,且反映了火灾现场、危害和灾后重建等情况。

唐永贞年间,文学家刘禹锡被贬朗州任司马,他亲身经历了在武陵发生的一次特大火灾全过程,目睹火灾的威力与无情后,遂写下千古流传的《武陵观火诗》,来反思火灾的起因以及灾后重建,其中他写道:“楚乡祝融分,炎火常为虞。是时直突烟,发自晨炊徒。盲风扇其威,白昼曛阳鸟……”这是一首典型的记事诗,火灾场景令人触目惊心,腾腾的烟雾透过窗户,飞舞的火焰从房梁和柱子上窜出。火势如同火山爆发,冲上半空,火星像雨点一样洒落在街道上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,是用火不慎造成火灾的发生,诗中还写到了灾后州太守下令免减税租,并帮助灾民重建家园。这首诗体现了刘禹锡的消防观,当时刘禹锡虽然仕途不顺,但他仍能以国事政务为要,这首《武陵观火诗》正是他意图消弭火患、令百姓安居乐业美好愿景的体现,对于预防火灾,战胜火灾,都具有启发和警示作用。

而刘禹锡的好朋友、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也十分注重火灾隐患的治理,唐宪宗元和七年,柳宗元同样被贬,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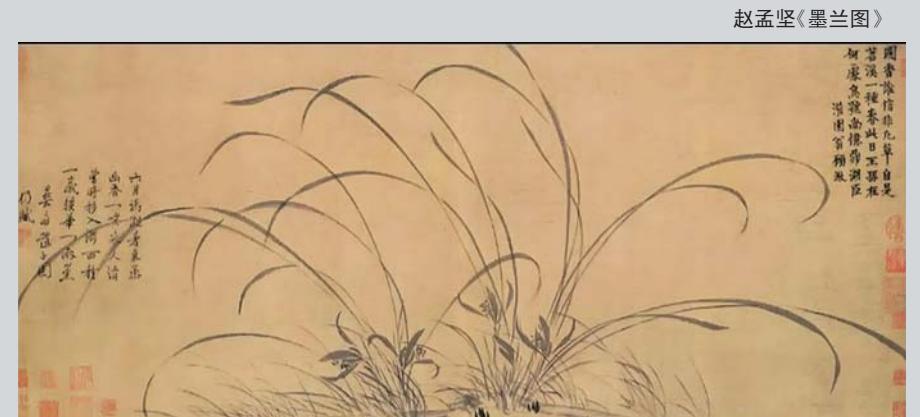
任永州司马,他发现当地的火灾十分严重,“日夜数十发,少尚五六发”,且出现老百姓白天不敢烧饭,夜里也不敢点烛,都爬到屋顶上左右张望、疲惫不堪的现象。经过他的调查了解,得知老百姓认为这是一种叫做“毕方”的怪鸟在作怪,只要它一出现就会发生火灾。老百姓并不清楚这怪鸟长什么样子,以讹传讹,之所以爬到房顶左右张望,是为了看是否有怪鸟飞来,生怕发生火灾,因此人心惶惶。面对这种情况,当务之急是要安定民心,于是柳宗元写下《逐毕方文》,希望以此驱除这个名为“毕方”的怪鸟,文中列举了“毕方”造成火灾的罪状,命令“毕方”速速离开。一纸《逐毕方文》虽然不可能驱逐“毕方”,却起到了安抚人心、消除老百姓对怪鸟的迷信和惊恐的作用,只要人心安定,防火的问题才容易解决。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颇关心百姓疾苦,以及他治理火灾的良苦用心,也体现了他的消防理念。

唐代火灾发生并不少见,尤其是寺庙成了火灾多发的重灾区。诗人张谓《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》一诗中“楼殿纵随烟焰去,火中何处出莲花”、诗人罗隐《甘露寺火后》一诗中“只道鬼神能护物,不知龙象自成灰”等,就反映了佛寺火灾的现实情况,在神灵崇拜十分普遍的唐代社会,他们的防火诗具有敢于破除迷信的思想,也是难能可贵的。

针对频发的火灾,唐朝廷没有等闲视之,制定不少相关措施来应对,《唐律》中增设了多项防火法律条文,对在皇陵、官府仓库和寺庙等重要场所发生火灾的情节严重者判处绞刑,并规定每个人都有报告火情和参与扑灭火灾的责任,见火不报、不救者也要受到惩罚。长安实施了坊市制度,并设立了左右金吾卫等治安机构负责维护社会秩序,进行火灾隐患的监管。夜间,坊市的门会关闭,街道上有巡逻队巡查,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及时发现并处理。还改进了灭火器具,当时已经采用了皮袋储水器和竹制溅筒喷水器,大大提高了扑灭火灾的效率,最大限度地减少火灾的发生与火灾发生时的损失。

诗人元稹针对江陵、洪州等南方地区的茅舍民居存在的严重火灾形势和安全隐患的实践,写了一首题为《茅舍》的诗作,中间数句聚焦火灾隐患:“南风五月盛,时雨不来下。竹蠹茅亦干,迎风自焚也。防虞集邻里,巡警劳昼夜。遗烬一星然,连延祸相嫁……”这首诗高度关注火灾引发的民生和救治问题,并提出要改造民居来根治火灾隐患。

诗人吴融还写了题为《废宅》的诗作,以警示火灾的巨大破坏力:“不独凄凉眼前事,咸阳一火便成原。”就是以史为鉴,吸取秦末咸阳宫阙遭焚毁的历史教训,做好防火工作。唐代的这些诗作,不仅记载了当时火灾的惨状,同时也在反思发生的原因,找出应对措施,对做好火灾预防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

□周东升

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”,杂花野草那未经雕饰的天然之美,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,甘于寂寞的隐忍品格,成为历代文人画士不惜笔墨描绘的物象。这其中,兰草、芦苇和红蓼,尤其受到青睐。

兰草性喜温暖湿润的山林坡地,其叶片疏朗,挺拔劲健,极具观赏价值。明代宋濂曾云:“兰为瑞草……每行逶迤深谷间,微风忽过而清馨悠悠远闻。”将兰草引入画作的第一人,据说是南宋画家赵孟坚,其好友周密如是记述:“赵孟坚墨兰最得其好,其叶如铁,花、茎亦佳……前人无此作也。”为刻画出兰草清秀文静、淡雅高洁的气质,赵孟坚所作清雅俊爽。他那幅传世之作《墨兰图》,笔调劲利而舒卷,意境清幽而雅致。图以淡墨绘兰草两丛,呈放射状的叶片俯仰伸展,参差错落,开合自然;土坡以飞白轻扫,略加点苔;兰花盛开,如蝴蝶翩然起舞;浓墨点蕊,与叶、花形成强烈对比。画面左侧自题“六月湘衡暑气蒸,幽香一喷冰人清”,寄托着作者孤高脱俗的文人情怀。

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是画兰妙手,他的兰花构思奇特,用笔爽利,画意高古,将兰草的作画技法推向率意、冷艳、简约的巅峰。八大山人作有一幅《空谷幽兰图》,在空旷的山野石缝间,一高一低、一正一欹分布着两丛兰草,间以几株幼竹渲染;一只鸟儿悠闲地飞落在大石上,石下是左高右低的土坡,坡上一丛浓淡相宜的兰草摇曳生姿,与巨石上的兰草遥相呼应;综观全图,



边寿民《芦雁图》



赵佶《池塘秋晚图》

一种悠然、孤寂、脱俗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八大山人的这幅兰石图,真正渲染出了“春去花还在,人来鸟不惊”的意境。

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草木凋零的暮秋,洁白、蓬松的芦花装点着江河湖泽、池塘沟渠。飒飒寒风中,轻柔的芦花四处飘零,触景生情,漂泊在外的游子往往会有乡愁绵绵,思绪万千,于是,“苦竹林边芦苇丛,停舟一望思无穷”这样的诗句应景而生。感慨的人多了,萧瑟秋风中的芦苇、大雁、浅滩,便成了一道冷艳的风景,文人以辞章咏叹,画士用妙笔留影。

唐代韦銮的《芦雁图》,是目前已知最早描绘芦苇的花鸟画作品。图中左下侧绘芦苇三株,姿态各异,简括明快,饶有情趣;右上侧留取大片空白,借代淫雨霏霏、连月不开的天空;右侧一株秆高大,形象完整;上立一鸟,枝活叶动。中间一株延展画外,给人以空间辽阔之感。左侧一株呈欹斜之势,既打破了画面的空间平衡,又化开为合,生发出顾盼掩映之姿,营造出自然灵动的意境。

继韦銮之后,历代画家纷纷效仿,清代画家边寿民成为又一高手。边寿民所作芦苇形象生动,摆脱了前人繁细的表现手法,删繁就简,形神兼备。他以写竹之法绘芦苇,饶有风骨,疏而道劲,浓淡、枯润、疏密兼而有之,多以赭墨绘滩头、芦苇,雅淡有致,深得遗貌取神的妙趣。

红蓼茎秆俏丽,枝叶扶疏,因其生存能力极强,既喜水又耐旱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故而被文人雅士视为坚韧顽强、志存高远的象征;而在文人心中,红蓼株形典雅,又寄托着思念故土、想念亲人的美好寓意。

宋徽宗赵佶对红蓼情有独钟,他笔下的红蓼形象不计其数。他所作的那幅《池塘秋晚图》,起首便是一株姿态灵动的红蓼,契合着“水乡占得秋多少,岸岸红云是蓼花”的诗意。画中红蓼呈迎风招展之姿,茎秆三枝,上开下合,高低有致,疏密有度;既顾盼生姿,又主次分明。

齐白石出生于江南水乡,对红蓼的形象自然再熟悉不过。他北漂之后,尤其是步入老年,思乡之情在所难免,红蓼便成了他寄托情感的寻常载体。齐白石曾作有一幅《红蓼蜻蜓图》,“绿萍合处蜻蜓立,红蓼开时蛱蝶飞”,一只红色的蜻蜓盘旋于红蓼之上,红蓼的花序色彩明快,鲜艳夺目,给人以热烈奔放之感,巧妙地表达出齐白石童年记忆中家乡那无比美好的一草一木,一虫一鸟,浓烈的乡愁仿佛在笔墨间流淌。